

· 南海问题研究 ·

再谈“嘉隆皇帝插旗”说的真实性 ——基于法国档案的研究

谷名飞

(中山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广州 510275)

摘 要: 法国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主张对西沙群岛的主权, 所持主要依据即所谓“嘉隆皇帝插旗”说。其论点及资料亦被后来越南政府沿用。本文通过对该时期法国外交档案的研究, 指出“嘉隆皇帝插旗”说是在法国外交部、殖民地部和印支殖民政府的指导与参与下, 为实现特定的外交及地缘政治目的而出台的。直接参与相关资料搜集与研究的法国本方官员申仲化及乐福一开始就对该说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其观点及论述具有很强启发性和重要价值。此后研究进一步证明塔伯特所提到的“帕拉塞尔”并非西沙群岛。故依据“嘉隆皇帝插旗”说无法主张对西沙群岛的任何权利。

关键词: 西沙群岛; 嘉隆皇帝; 印支殖民政府; 塔伯特; 主权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南海断续线的法理与历史依据研究”(14ZDB165)

一、问题的提出

自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 法国印支殖民政府、外交部、殖民地部和海军部开始集中搜集有关西沙群岛的资料, 试图证明法国对它的主权, 但未获进展。如 1930 年 4 月 3 日法国外交部长布里昂(A. Briand)所承认的, “在当时的情况下(1921 年), 没有办法主张法国对帕拉塞尔(Paracel)群岛的主权”^①。从 20 世纪初到 20 年代末, 法国在西沙群岛问题上一直保持低调, 法国外交部长布里昂在 1929 年 2 月 26 日回复殖民地部长的信函中明确指出, 自 1921 年以来, 法国在西沙群岛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 在遵守中法之间于 1897 年 3 月 12-15 日以及 1898 年 4 月 4-10 日达成协议的前提下, 法国承认中国对西沙的主权。^②

到了 20 年代中后期, 受两方面因素影响, 法国这一立场开始发生转变: 一方面是客观因素, 即日本开始觊觎西沙群岛。长期以来, 法国对西沙群岛的基本看法是, 岛礁本身的价值不大, 但战略位置重要。如果被其他西方列强占领, 将威胁法国在印支地区的利益及安全。^③ 另一方面是主观因素, 即认为发现了新的“历史证据”。在法国印支代理总督霍班(René Robin)

① 法国外交部长致法国驻北京公使的信函(1930 年 4 月 3 日), 法国外交部档案, 全宗号 E-513-9 sd/1, 卷号 743 第 15 页。

② 法国外交部长至海外殖民地部长的信函(1929 年 2 月 26 日), 法国外交部档案, 全宗号 E-513-9 sd/2, 卷号 312 第 118 页。

③ 关于法国最早对西沙群岛战略价值的认识, 可见法国驻广州代办伯威 1909 年 5 月 4 日的信函, 他认为“西沙群岛有一定重要性, 因为它位于香港和西贡的中间, 是航海的危险地区, 需要更加了解这块水域。”(见“Annexe 17, Lettre de Monsieur Beauvais, consulat de France à Canton à Monsieur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4 mai 1909, Monique Chemillier-Gendreau, *La souveraineté sur les archipels Paracels et Spratleys*, L'Harmattan, 1996, pp.207-211)

的推动下,从20年代中期开始,印支殖民政府开始搜寻安南与西沙群岛有关的证据。印支殖民地顺化市政府委员柯塞哈特(Henri Cosserat)在让西尼(Dubois de Jancigny)的书中看到塔伯特(Jean Louis Tabert)主教关于嘉隆皇帝在1816年登上帕拉塞尔并举行升旗的描述,认为此线索很重要,或许能成为法国主张对西沙群岛主权的依据。

我们知道,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西方文献中“帕拉塞尔”是指与越南海岸线平行的一大片形似牛角的岛屿或沙礁,1830年代之后“牛角”才逐渐在地图上消失,其名称被移到了今西沙群岛。法国急切地抓住“嘉隆皇帝插旗”说,一是缘于“帕拉塞尔”在20世纪就已经是西沙群岛的西文专名;二是“插旗”时间早于1909年李准巡视西沙,以便证明安南在1816年已经占领西沙群岛。

这种移花接木的说法自提出伊始,即受到了我国官方及学者的批驳。早在中法交涉的1933年,中华民国外交部即以基本的历史事实批驳了尚在藩属时期安南王到西沙“插旗”的荒唐说法,指出“该岛上历来仅有琼崖人采矿捕鱼,安南王凭何特殊关系,来此树碑建塔。法方摭拾安南一二遗史,牵强附会,殊不知百年前安南系我藩属,于宗主国之领土,私谋独立占领,事理所无。”随后又补充道“且中国历史及书籍中,亦均无该岛曾为属国安南占领之记载;是越史所载,殊属失实。”^①明确质疑法国所提出“嘉隆皇帝插旗”说的真实性。此后,韩振华指出“1816年嘉隆王所占领的帕拉塞尔,是占领帕拉塞尔群岛南端的一些荒凉岛屿,包括西色尔地岛在内。”^②吴凤斌也认为“塔伯特所记载的帕拉塞尔,恰恰不是西沙群岛,而是从占婆岛,广东群岛延伸到平顺海岛的越南沿岸的岛屿。”^③近期又有许盘清、曹树基从地图学上证明,塔伯特主教所述1816年越南嘉隆皇帝插旗之地,只能是“牛角”,不可能是西沙群岛。而塔伯特提到的“这个帕拉塞尔不是西沙群岛。”^④丁雁南则从人物考据上,指出1816年塔伯特尚未抵达安南,他只能是通过间接渠道知道此事;并认为“嘉隆皇帝插旗”说完全是塔伯特借鉴他所熟知的欧洲常规,通过夸张的想象,把从他人那里获知的阮朝“黄沙队”的活动虚构成了一场威严雄壮的占领行为。^⑤

以上分析,已基本指出“嘉隆皇帝插旗”说所存在的两方面问题:(1)塔伯特书中描述“嘉隆皇帝插旗”一事的真实性值得怀疑;(2)塔伯特书中提到嘉隆皇帝所登的“帕拉塞尔”并非西沙群岛。故以此无法主张对西沙群岛的主权。

本文基于对法国外交部档案的研究,从法国官方文件角度对“嘉隆皇帝插旗”说的真实性提两点补充:其一,该说的出台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是在法国外交部、殖民地部、海军部和印支殖民政府的直接参与和指导下,为了达到争夺西沙群岛的目的,在很薄弱的史料基础上,仓促提出的;其二,该说的真实性自提出伊始,即受到法国和安南两方直接参与相关资料搜集与研究的官员的质疑,他们对诸多细节的分析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重要价值。在法国政府不再提“嘉隆皇帝插旗”说后,越南政府与学者重拾此说,作为主张其对西沙群岛所谓“主权”的历史依据,其对法国资料的解释与使用也存在诸多问题。

- ① 《为西沙群岛事(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二十日)》〔Ⅱ(2):047号档案〕,俞宽赐、陈鸿瑜《外交部南海诸岛档案汇编》上册,台北“外交部”研究设计委员会,1995年,第150页。
- ② 韩振华《古帕拉塞尔考(其一)》,韩振华主编《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93页。
- ③ 吴凤斌《驳南越阮伪政权白皮书所谓拥有我国西、南沙群岛主权的论据》,《南洋问题研究》1979年第4期,第92页。
- ④ 许盘清、曹树基《西沙群岛主权:围绕帕拉塞尔(Paracel)的争论——基于16-19世纪西文地图的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第30页。
- ⑤ 丁雁南《史实与想象“嘉隆王插旗”说质疑》,《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第97页。

二、“嘉隆皇帝插旗”说提出的背景及目的

法国政府是从1909年李准巡视西沙后,开始真正关注西沙群岛问题。最初,出于法国一贯的殖民者姿态,如同当时法国驻广州领事伯威(Bauvais)在信中所表达的一样“虽然我目前并没有看到任何相关证据,但我认为法国应当可以和中国一样主张对帕拉塞尔群岛主权。”^①此后,法国印支殖民政府、外交部、殖民地部和海军部一直就法国在西沙群岛问题上应采取的态度进行讨论,其核心在于权衡法国在当时国际及地区局势下,争夺西沙群岛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所谓“可行性”,即法国基于什么历史证据或官方文件可以主张对西沙群岛的主权;而“必要性”则是指占领西沙群岛会给法国带来何种利益及危害。

法国驻广州领事伯威在致法国外交部的信函中明确表示,法国主张对西沙群岛的主权可能会引起中国民众的反法情绪,影响法国在中国的利益。因此,他建议法国可以对中国政府在西沙群岛的活动,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②伯威的这个意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国外交部的立场,即认为没有必要因为争夺西沙群岛这样一些荒芜的岛礁,而影响法国在中国的利益。虽然,此后法国印支殖民政府内部一直存在不同声音,^③但该立场维持了近二十年。

直至1928年,印支代理总督霍班得到消息称中国广东省政府有意在西沙群岛建厂开采鸟粪,专门询问法国海外殖民地部和外交部,如果中国政府真的采取行动,该如何应对?^④法国政府开始重新思考其在西沙群岛问题上的立场。

1930年6月30日,法国外交部长在致殖民地部长的信中明确表示,法国政府有两种态度可以选择:一是如果认为目前掌握的证据不足以主张法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则在满足一定前提下,应当正式承认中国的主权(这是他个人的看法);二是如果认为西沙群岛非常重要,法国应当占领它,则需尽快补充相关证据材料,并向中国表达抗议(这是殖民地部长的看法)。^⑤最后,在殖民地部长的指示下,法国外交部在1931年12月4日正式向中国驻巴黎使团发出外交抗议,并主张法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

三方面的因素让法国政府在西沙群岛主权问题上选择了第二条路线:(1)个人的积极推动。如果说前两任印支总督萨罗特(Albert Sarraut)和隆(Maurice Long)都主张“默认”中国对西沙群岛主权,那么从20年代霍班代理印支总督后,出于他和法国商业界的紧密关系,开始积极推动法国占领西沙群岛。其继任者帕斯奇耶(Pierre Pasquier)(1928-1934)尽管初期不太赞同霍班的意见,后来也完全支持这一立场。(2)所谓新“历史证据”的发现。法国想要争夺西沙群岛主权,却一直受制于没有可以支持其主张的证据材料。直到1928年霍班提出找到了安南曾占领过西沙群岛的证据,也就是所谓的“嘉隆皇帝插旗”说时,法国政府为之一振(全然不顾此“帕拉赛尔”并非“西沙群岛”的事实)。(3)周边局势的变化。随着法国对西沙群岛认识的加深,越来越意识到它在经济、军事及航道上的战略价值。因此,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

① 法国驻广州领事伯威致法国外交部长的信函(1909年5月4日),见“Annexe 17, Lettre de Monsieur Beauvais, consulat de France à Canton à Monsieur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4 mai 1909, Monique Chemillier-Gendreau, *La souveraineté sur les archipels Paracels et Spratleys*, L' Harmattan, 1996, pp.207-211.

② 法国驻广州领事伯威致法国外交部长的信函(1909年5月4日)。

③ 比如,1931年法国印支殖民政府喉舌西贡《舆论报》两次发表社论,要求占领西沙群岛(见韩振华主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672页)。

④ 法国外交部长致殖民地部长的信函(1930年3月31日),法国外交部档案,全宗号E-513-9 sd/1,卷号714,第106页。

⑤ 法国外交部长致殖民地部长的信函(1930年6月30日),法国外交部档案,全宗号E-513-9 sd/1,卷号714,第44页。

法国政府急切地要抢先占领西沙群岛,以保障其在印度支那地区的利益。

从20世纪10年代法国政府开始关注西沙群岛并搜集相关资料,到30年代初“嘉隆皇帝插旗”说的正式出台,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0-1920年,印支殖民政府开始在当地搜集关于西沙群岛主权问题的资料,但一无所获。

法国政府在1909年后开始真正关注西沙群岛。如法国驻广州公使伯威在1909年5月4日致法国外交部的信函中表示“虽然我目前没有看到任何相关证据,但我认为法国应当可以和中国一样主张对帕拉塞尔的主权”,而且,“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些对我们有利,可以达到我们目的的论点”。^①从伯威信函看出以下两点:其一,他认为中国完全可以主张对西沙群岛的主权,但他认为法国和中国一样,也可以主张它的权利;其二,伯威当时并没掌握任何可以证明法国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的证据,但他推测印支殖民政府应该很容易找到相关资料(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到了1920年,日本三井商船公司(Mitsui-Bussan Kaisha)致信法国印支殖民政府海军指挥官雷米(Remy)上校“帕拉塞尔群岛是否为法国所有?”雷米在9月24日的信中回复道:“在海军正式文件中,没有任何关于帕拉塞尔群岛所有权的记录。我可以保证帕拉塞尔不为法国所有。”^②雷米的回答经过1921年1月22日法国《新欧洲》(L'Europe Nouvelle)杂志的报道后,在法国引起了很大反响。西沙群岛重新进入法国公众的视野。法国外交部对此专门做了一个内部调查,想要进一步明确法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问题。

第二阶段,1921-1925年,法国政府各部门开始搜集有关西沙群岛主权问题的资料,同样一无所获。

自雷米的回答被媒体报道以后,法国外交部、海军部、殖民地部和印支殖民政府开始联合搜集有关西沙群岛主权问题的资料。

1921年5月30日,印支总督隆在对雷米事件的调查过程中,查遍所有有关资料后,做了一个他认为关于该问题最详细的报告,提交给法国殖民地部长。该报告的核心观点有三个:(1)关于西沙群岛的主权归属,法国没有做过任何官方的表态,雷米的回答不代表印支殖民政府;(2)对于中国在西沙群岛的活动,法国不应该表达抗议,这样会有损法国在中国的利益;(3)作为法国承认中国对西沙群岛主权的交换条件,应该要求中国承诺不在西沙群岛设置任何军事设施。^③

法国外交部基本同意隆的意见,并在8月22日指示法国驻中国代办莫格拉斯(G. Maugras):“要中国政府公开声明不在这些岛屿布防,作为法国承认中国对帕拉塞尔群岛主权的交换条件。”^④但驻北京代办莫格拉斯回复说,由于现在北京有一个法律上的政府,在广东有一个事实上的政府,他不知道应该向哪个政府交涉。^⑤所以这件事就被搁置下来。

第三阶段,1925-1930年,印支殖民政府开始试图证明安南曾占领过西沙群岛。

① 法国驻广州代办伯威致法国外交部长的信函(1909年5月4日),见“Annexe 17, Lettre de Monsieur Beauvais, consulat de France à Canton à Monsieur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4 mai 1909, Monique Chemillier-Gendreau, *La souveraineté sur les archipels Paracels et Spratleys*, L'Harmattan, 1996, pp.207-211.

② 谭玉华《二战前法国南海政策的演变》,《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5期,第60页。

③ 法国印支殖民地总督致外交部长的信函(1921年5月30日),法国外交部档案,全宗号E-513-9 sd/2,卷号312,第45页。

④ 《法国关于西沙群岛问题的部分档案》,广州:广州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1976年1月,第10页。

⑤ 《法国关于西沙群岛问题的部分档案》,第11页。

从20年代中期开始,印支殖民政府内部就有人主张安南对西沙群岛的主权,直到20年代末才得到印支总督的重视,并以此为依据开始主张法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

最初是顺化市政府委员柯塞哈特偶然在一本书中看到安南曾经在历史上占领过帕拉塞尔群岛,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他在1925年2月27日致信给当时顺化朝廷兵部尚书申仲化(Than Trong Hue),委托他专门对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之后,法国驻安南钦使乐福(Aristide Eugene Le Fol)在1926年6月17日给印支总督的信中也提到这个信息,表示安南王国可能曾经占领过帕拉塞尔群岛,他目前正在搜集相关资料。乐福提供的信息直到1929年才得到印支总督帕斯奇耶的重视,他在1929年1月12日的回信中指示乐福继续搜集安南与帕拉塞尔有关的证据,“你于1926年6月17日的信函中(表示)安南政府或许曾对该群岛确定过自己的主权……请为此继续找有利证据,哪怕是一点一滴……请你在最短时间内,把你能搜集到的相关材料报告给我。”^①最终,申仲化和乐福分别在1925年3月5日和1929年1月22日就他们所搜集和了解的情况做了回复和报告,并附上相关材料。

乐福提出的观点和搜集的材料引起了法国政府高层的注意。法国海军部长(代理殖民地部长)在1929年2月18日致外交部长的信函中表示“霍班之前提出过一个设想,就是基于已有的历史文件主张印度支那对帕拉塞尔群岛的主权。由于这些文件还没有被系统整理出来,所以目前我们在该问题上的立场仍然是有条件地承认中国对帕拉塞尔的主权。”之后,他又补充道“我刚收到印支政府关于中国经济和政治情况的一个报告。我注意到里面有一段文字,似乎说霍班多次提到的我们对帕拉塞尔群岛的历史权利来自于安南王国。”“安南比中国更能主张对帕拉塞尔的主权,法国作为安南的保护国应该维护这个权利。”^②

法国外交部长在1929年2月26日的回信中表示“收到您18日的信函。印支政府目前提出一个基于某些历史依据可以主张法国对帕拉塞尔群岛主权的设想。印支政府认为法国应该改变自1921年以来所采取的立场,即在落实1898年中法条约相关条款的前提下,承认中国对帕拉塞尔主权的立场。但是,就印支殖民政府在1929年12月17日的声明和18日的信件来看,我认为材料还不足够充分,不足以让我们改变立场。我要在看到霍班提供的所有材料之后,才能做进一步的决定。”^③

霍班所提供的相关材料最终在1929年4月13日由殖民地部长转交给外交部长,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科塞哈特最早注意到塔伯特主教的一段话“我们不去列举(属于)交趾支那的那些主要岛屿。我们只请注意的,早在34年前,被越南人称之为‘葛鑽’的帕拉塞尔群岛——包括曾使航海者非常害怕的许多纵横交错的礁石岛屿和沙滩——已被交趾支那的越人所占据。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曾在那里设置了一个什么机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嘉隆皇帝很重视在他的王冠上增添那枝奇异的花朵,因为他觉得必须亲自出海去占有这些岛屿,于是1816年,他在那里隆重地树立了交趾支那的旗帜。”^④(2)乐福在安南当地所搜集,并用法语翻译的《大南一统志》卷六《安南政府年鉴》,《南越地理》卷二《明命地理》以及《大南一统志》

① 《法国关于西沙群岛问题的部分档案》,第14页。

② 法国海军部长(代理殖民地部长)致外交部长的信函(1929年2月18日),法国外交部档案,全宗号E-513-9 sd/2,卷号312,第114页。

③ 法国外交部长致海军部长(代理殖民地部长)信函(1929年2月26日),法国外交部档案,全宗号E-513-9 sd/2,卷号312,第117页。

④ 转引自戴可来、董力编《越南关于西南沙群岛主权归属问题文件资料汇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7页。越南文版由蔡文检译。值得注意的是此译本把原文中的“安南人”(Annamites)译成“越南人”,把“交趾支那人”(Co-chinchiois)译成“交趾支那的越人”。

卷六《维新地理》中的部分段落。^①

此外,越南人阮国胜在其著作《黄沙,长沙》中说塔伯特这段话出自于1833年出版的《寰宇志,一切民族的历史以及他们的宗教、风气和习俗之概况》(*Univers,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de tous les peuples, de leurs religions, moeurs, coutumes*)。^②实际上,这段话出自于1837年孟加拉亚洲协会刊印日记中所收录的塔伯特所著并被译成英文的《交趾支那地理》一书。^③此后,该段话又被让西尼在他1850年出版的《寰宇志,一切民族的历史以及他们的宗教、风气和习俗之概况——日本、印度支那、锡兰等》(*Univers,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de tous les peuples, de leurs religions, moeurs, coutumes etc. - Japon, Indochine, Ceylan etc.*)一书中全文引用。所以,阮国胜才会误认为这本书是塔伯特所著,时间也误作1833年。^④

以上两方面的资料即成为此后法国政府提出“嘉隆皇帝插旗”说,并主张对西沙主权的重要历史依据。

第四阶段,1931年后,法国政府正式提出“嘉隆皇帝插旗”说并主张对西沙群岛的主权。

1930年6月30日,法国外交部长致殖民地部长的信中表示“在研究了乐福关于‘嘉隆皇帝插旗’的相关报告后,我认为我们目前不适合向中国政府直接提出我们对帕拉塞尔群岛的主权。从1921年至今,我们两个部门都同意在遵守中法之间在1897年和1898年协议的基础上,承认中国对帕拉塞尔的主权。我们都认为这个立场最有利于维护我们在该地区的利益……如果您同意我的意见,我将让我们驻北京的大使在合适的时机正式向中国政府表明这一立场。虽然受各种情况的限制,我们一直没机会这么做,但这一立场已经确立了9年。”^⑤“如果您的意见和我相反,认为我们应当主张对帕拉塞尔的主权。……则应该马上向中国政府表达抗议。但是乐福提供的资料还不够充分,如果您认为要主张法国的主权,则应该立即更全面地搜集安南对帕拉塞尔拥有过主权的材料。”^⑥

1930年7月26日,法国驻北京公使韦尔登(Wilden)也致函法国外交部长布里昂,表示基于安南对西沙群岛的历史权利,法国应该抗议中国在西沙群岛的行动,以免中国对西沙群岛的占领成为既成事实。^⑦

与此同时,印支殖民地总督帕斯奇耶也在积极游说,推动法国政府改变在西沙群岛问题上的立场。在其1930年10月18日致殖民地部长的信中表示“随函附上乐福先生在高级专员公署和顺化宫廷档案室里搜集的资料……这些资料是在顺化所能找到有关帕拉塞尔问题的唯一资料。”“您一定会和我一样认为它们足以无可辩驳地建立安南对帕拉塞尔群岛的有效占领。”^⑧

① 在1931年末,法国外交部提出“嘉隆皇帝插旗”说时,尚未注意到阮文胜(Jean-Baptiste Chaigneau)及郭士立(Karl Gutzlaf)等人的相关论述。

② 参见自戴可来、童力编《越南关于西南沙群岛主权归属问题文件资料汇编》,第307页。

③ Jean-Louis Taberd, “Note on the Geography of Cochin China,”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6(2), 1837, p.745. 关于这段话的真正出处,在科塞哈特致印支殖民政府的报告中已经明确说明(见法国外交部档案,全宗号E-513-9 sd/1,卷号743,第142页)。

④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丁雁南会在其文中指出“笔者尚未找到引文的原始出处。可以肯定的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网页上有关塔伯特的著作列表中并没有这一项。”(参见丁雁南《史实与想象——“嘉隆王插旗”说质疑》,《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第95页)

⑤ 法国外交部长致殖民地部长的信函(1930年6月30日),法国外交部档案,全宗号E-513-9 sd/1,卷号743,第44页。

⑥ 法国外交部长致殖民地部长的信函(1930年6月30日),法国外交部档案,全宗号E-513-9 sd/1,卷号743,第44页。

⑦ 法国驻北京公使致函法国外交部长的信函(1930年7月26日),法国外交部档案,全宗号E-513-9 sd/1,卷号743,第54页。

⑧ 法国印支殖民政府总督致外交部长(1930年10月18日),法国外交部档案,全宗号E-513-9 sd/1,卷号743,第113页。

最后,法国殖民地部长在1931年9月9日回复外交部长的信函中明确了他的态度:在考虑了您的建议后,我认为应当指示法国驻北京公使韦尔登向中国政府表达外交抗议,并主张对西沙群岛主权。如果中国政府拒绝接受我们的立场,可以考虑提起国际仲裁。但他随后又补充道:如果用尽一切法律手段还是无法主张安南对西沙群岛的主权,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之前的立场上来,即在一定条件下,承认中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①

于是,法国外交部于1931年12月4日正式对中国驻巴黎使团提出抗议(法国)外交部荣幸地提醒中国驻巴黎使团注意帕拉塞尔群岛问题。这些群岛……一向是隶属于安南帝国……1816年嘉隆皇帝最后一次在该群岛确立自己的权力,他隆重地树起国旗,以示正式占领。”^②这也是法国外交部第一次正式对中国提出“嘉隆皇帝插旗”说。

纵观“嘉隆皇帝插旗”说的出台过程,可以看出申仲化和乐福所提交的报告起到了关键作用,成为法国提出“嘉隆皇帝插旗”说主要依据和资料来源。

三、法国本方官员对“嘉隆皇帝插旗”说的质疑

印支殖民政府委托法国驻安南钦使乐福和顺化朝廷兵部尚书申仲化负责“嘉隆皇帝插旗”说相关资料的搜集与研究,是经过仔细考虑的:一方面这两人长期身处印支官僚体系之中,深知法国在西沙群岛问题上的利益和立场,也都认为安南曾占领过“帕拉塞尔”群岛;另一方面乐福作为一个法国人,长期在印支殖民地工作,便于查找当地法文资料及档案。而申仲化作为一个安南人,对当地政治、历史和文化都非常熟悉,便于查找用当地语言所写的资料和档案。

正是这两位对相关情况最为了解,直接参与了相关资料搜集与研究的法国本方官员,在谈到“嘉隆皇帝插旗”一事的相关细节时,对该说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并做出说明,可以成为我们判断该事件真实性的重要依据。

1. 法国驻安南钦使乐福的质疑与保留

乐福作为法国驻安南钦使,是“嘉隆皇帝插旗”说出台的关键人物之一。在印支总督帕斯奇耶要他尽快搜集相关资料后,他于1929年1月22日的回函中详细论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相关内容翻译如下:

在1926年芽庄海洋学院的院长巡游(帕拉塞尔群岛)以前,他已经对这个问题(帕拉塞尔的归属)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在那之后没有任何新的材料可以帮助我们明确地判定它的归属。我只能把之前的调查结果重新复述一遍

……直到19世纪初帕拉塞尔群岛才被注意到,之前一直是“无主之地”……1838年的孟加拉亚洲协会刊印的日记中收入了塔伯特主教被译成了英文的《交趾支那地理》一书。其中,他引述了1816年嘉隆皇帝占据帕拉塞尔群岛的事件,并且他有可能在那举行了升旗仪式。

关于嘉隆皇帝亲自占领帕拉塞尔这件事的真实性,我们其实是可以提出质疑的。但是从《安南政府年鉴》或《大南一统志》第6卷,《皇越地輿志》第2卷或明命14年出版的《安南地理》,以及《大南一统志》6号或维新(皇帝)时地理的记载来看,它们

① 法国殖民地部长致外交部长的信函(1931年9月9日) 法国外交部档案,全宗号E-513-9 sd/1,卷号743,第294页。

② 《法国关于西沙群岛问题的部分档案》,第37页。

都确信有这么一回事,并且具有效力。

这些材料都保存在安南政府档案馆中,根据这些书籍的描述,这件事的大致过程是这样的:

在前朝就已经组建了一支 70 人的黄沙队……后来嘉隆皇帝重新组织了黄沙队,之后又把它撤销了,后来似乎也没有再重新组建。明命皇帝也派了几个探险队到岛上,发现了一个刻着汉字的庙……

目前看来,安南和帕拉塞尔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了,沿海的渔民和船夫完全不知道这些岛屿的存在,也没有任何人再去过那儿。但我们的保护国可能很早以前就占领过帕拉塞尔群岛,顺化朝廷兵部尚书申仲化(1925 年去世)还在 1925 年 3 月的一封信中说过“这些岛礁一直属于安南,这是不容置疑的”。^①

在乐福给印支殖民政府的这封回信中,有以下三点值得关注:

第一,关于西沙群岛的主权问题。乐福在看到塔伯特关于“嘉隆皇帝插旗”的描述后,认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判定帕拉塞尔群岛的归属”。也就是说,他认为仅依据这段话并不能主张法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

第二,关于嘉隆皇帝插旗的行动,他用的是“aurait”(qui aurait aboré solennellement le pavillon cochinchinois),在法语中,这是一个过去条件式的用法,表达的是作者推测某件事已经发生,但又不能肯定时的一种用法。在这样一个关键的作为上,乐福选择使用条件式,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该行动真实性的怀疑。后一段他更直白地表明“关于嘉隆皇帝亲自占领帕拉塞尔这件事的真实性,我们其实是可以提出质疑的”。

第三,乐福的说法从侧面印证了韩振华、许盘清等人的研究结论,即塔伯特书中提到的“帕拉塞尔”并非西沙群岛:一方面乐福证实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安南与帕拉塞尔已经没有任何联系,当地渔民没去过,也不知道它在哪;另一方面,在他搜集的《大南一统志》《皇越地輿志》等资料中又确实有安南渔民到帕拉塞尔活动的记录。这一矛盾恰好证明,在 19 世纪 30 年代,塔伯特的书及《大南一统志》等资料所记载的帕拉塞尔只是越南中部沿海的一些岛礁,所以当地渔民才会经常前往。但是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乐福概念中的帕拉塞尔已经变成西沙群岛,当他再去询问安南渔民相关情况时,才会出现他们“完全没听过,没去过,也忽视其存在”的情况。

2. 顺化朝廷兵部尚书申仲化的质疑与保留

在“嘉隆皇帝插旗”说的出台过程中,另一个人物也很重要,就是乐福在 1929 年 1 月 22 日回函中提到的顺化朝廷兵部尚书申仲化。

当顺化市政府委员柯塞哈特很偶然地在让西尼的书中看到有关“嘉隆皇帝插旗”的论述后,敏锐地察觉到这可能是一条可利用的材料。于是,柯塞哈特在 1925 年 2 月 27 日特意致信顺化朝廷兵部尚书申仲化,向他提出了几个关键性问题。部分内容翻译如下:

我在一本法国的书中看到^②,帕拉塞尔(这些岛礁在离土伦港不远,在它的东部)

① “Annexe 8: Lettre du Résident supérieur en Annam à Monsieur le gouverneur général de l'Indochine, 22 janvier 1909,” Monique Chemillier-Gendreau, *La souveraineté sur les archipels Paracels et Spratleys*, pp.173-174.

② 该书是指: Dubois de Jancigny, *L'univers -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de tous les peuples, de leurs religions, moeurs, coutumes etc. - Japon, Indochine, Ceylan etc.*, Paris: Permin Diderot Frere editeur, 1850.

属于安南王国^①而嘉隆皇帝曾亲自登上过这些岛。如果这一情况属实,那么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个人很希望您能对该事件的相关问题做一些研究:(1)这件事的真实性如何?(2)他乘坐什么船去的岛上,谁陪同前去?(3)具体是在哪一年去的?(4)从哪一年安南开始主张对帕拉塞尔的主权?(5)这本书的法国作者说安南人把这些岛称作 Cat-Vang(越南语中的“葛鑽”,即“黄沙”——引者注)是真的吗?(6)还有哪些安南当地的书籍提到了这件事?(7)我可以借阅这些书,或者至少给我看这些书中与帕拉塞尔有关的文字吗?^②

申仲化在接到印支殖民政府官员的询问后,在1925年3月3日的回信中给出了他的意见:“我没有找到任何与嘉隆皇帝登岛有关材料,我也不相信皇帝会亲自参与这么一个并不重要的行动。在嘉隆和明命时期,确实有很多官船经常到岛上去,明命16年还运过一些石头到岛上,想要建一个庙。也许是根据这些信息,这些欧洲的作者会误认为嘉隆皇帝曾经到过岛上。”^③

申仲化的这段回复说明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安南人,官至兵部尚书,他远比那些欧洲国家的官员更了解当地的政治文化。在他看来,安南王完全不可能为了占领沿海几个不重要的荒岛,亲自出征,并举行非常西方化的升旗仪式。所以,嘉隆皇帝亲自登岛插旗的可能性很低。第二,申仲化在翻遍了安南政府的档案后,没有看到对该事件的任何记载。如果真是皇帝登岛这么重大的事件,是不可能没有官方记载的。所以他很合理地推测,这是欧洲人在游历过程中,在不了解历史背景的情况下,根据一些传言做的个人想象和错误引述。申仲化的意见再次证实塔伯特的相关描述可信度很低。

四、越南对于“嘉隆皇帝插旗”说的后续利用及问题

在“嘉隆皇帝插旗”说出台过程中,法国本方官员已经对该事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不认为嘉隆皇帝会亲自登岛插旗。但出于争夺西沙群岛主权的目,这些意见被法国政府所忽略。此后,越南政府开始觊觎西沙群岛,继续基于同样的逻辑与论点,以“嘉隆皇帝插旗”说作为主张其对西沙群岛拥有所谓“主权”的历史依据之一。

这些观点主要集中在阮雅主编的《黄沙长沙特考》以及越南政府在1975年发布的《关于黄沙(帕拉塞尔)群岛和长沙(斯普拉特利)群岛的白皮书》中:如朗湖的《越南的领土:黄沙和长沙》;蔡文检的《确凿证明越南主权的一些西方史料和从法属时期至今的黄沙、长沙群岛》;陈大登夫妇的《从法属时期到现在确认越南对黄沙和长沙两群岛享有主权的正式文件》;越南白皮书中的《黄沙群岛和长沙群岛——越南领土》以及武海鸥的《越南对黄沙和长沙两群岛的主权非常清楚,不容争辩》等。它们都引用了塔伯特关于“嘉隆皇帝插旗”说的相关论述。^④

① 这句话的原文是“Dans un ouvrage français, j'ai lu que les îles Paracels (group d'îlots qui se trouve non loin et à l'est de Tourane) appartenaient aux Annamites”。值得注意的是,柯塞哈特认为帕拉塞尔群岛位于土伦港(今岬港)东面不远的海上。

② 柯塞哈特致顺化朝廷兵部尚书的信函(1925年2月27日) 法国外交部档案,全宗号E-513-9 sd/1,卷号743,第141页。

③ 顺化朝廷兵部尚书致柯塞哈特的信函(1926年3月5日) 法国外交部档案,全宗号E-513-9 sd/1,卷号743,第140页。

④ 参见阮雅等《黄沙和长沙特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戴可来、董力合编《越南关于西、南沙群岛主权归属问题文件、资料汇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总体考察越南方面对该时期法国资料的使用,特别是对乐福和申仲化报告的引用,明显存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在提到顺化朝廷兵部尚书申仲化给印支殖民政府的回复时,只强调其在信中说过的“那些岛礁一直都属于安南”,但是完全不提他在信中否认了嘉隆皇帝亲自登岛插旗的可能性,并认为欧洲人士在引述该事件时,只是以讹传讹的看法。第二,在提到乐福提交给法国外交部的报告时,只强调他提到了“嘉隆皇帝登岛”这件事,完全不提乐福在该报告中对事件真实性的怀疑,以及乐福所证实的,安南当地渔民与西沙群岛没有任何联系的事实。特别是乐福在报告中,开篇即表明目前“无法判断帕拉塞尔群岛的归属”,完全不认为基于已有资料可以主张安南对西沙群岛的主权。第三,乐福报告的内容也直接否认了部分越南学者的观点,即认为自1816年嘉隆皇帝插旗后,安南政府有对西沙群岛进行持续有效的管辖。乐福在报告中明确表示没有材料可以证明印支政府有持续地主张对西沙群岛的主权。

五、结 论

1932年,中华民国外交部文件中指出“查法国历次来文,所恃为惟一之根据,系安南历史,曾载有嘉隆王朝于一八一六年正式占领该岛;谓在中国一九〇九年占领之先云云。如能将此点打破,则其余理由,自不成立。”^①因此,“嘉隆皇帝插旗”说对法国及之后越南政府关于西沙群岛所谓“主权论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回顾最早“嘉隆皇帝插旗”说的出台过程,反映了随着当时地区局势的变化及法国对西沙群岛战略价值认识的加深,在两任印支总督霍班及帕斯奇耶的积极游说与推动下,由两位印支官员凭藉传说和零碎的资料,最终促使法国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幅度改变其在西沙群岛问题上的立场,开始主张法国主权的一段历史。虽然,法国的图谋没有得逞,但相关论点及资料被越南政府所沿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继续以“嘉隆皇帝插旗”说为主要历史依据,主张其对西沙群岛的所谓“主权”。

追根溯源,通过对法国出台“嘉隆皇帝插旗”说相关资料及档案的研究,可以看出该说既缺乏历史事实的基础,也缺乏完整翔实的文献记录的支持,其“真实性”一开始就被负责相关资料搜集和研究的法国及安南官员所质疑。法国外交部在研究相关材料后也认为以此无法主张法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更重要的是,此后的许多研究已证实,“嘉隆皇帝插旗”说所提到的“帕拉塞尔”仅是越南沿岸的岛屿,并非西沙群岛。因此,依凭所谓“嘉隆皇帝插旗”说无法主张对西沙群岛的任何权利。

(责任编辑 赵枫)

^① 《抄录关于西沙群岛(Iles Paracels)问题法外部复文(民国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Ⅱ(2):046号档案〕,俞宽赐、陈鸿瑜《外交部南海诸岛档案汇编》上册,第148页。

affects female employees relatively less than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n-contingent punishment and employees' silence. This paper end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finding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practices.

On the Authenticity and Validity of the “Flag-planting” Argument: A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Study of French Diplomatic Archives

GU Ming-fei

From the beginning of 1930s, France put forward an argument that King Jia Long once planted a flag on the Paracels in 1816, which was used, in turn, to legitimize its territorial claim. This argument was also used by the Government of Viet Nam. Since th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academic community have pointed out the main problems of the “flag-planting” argument.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French diplomatic archives with this time perio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lag-planting” argumen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French Government and points out that French Indo-China govern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of the Colonies and Ministry of Marine all made their political influence felt in the fabrication of this argument, aiming to make specific diplomatic and geopolitical gains. The French officials, who were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information concerned, just questioned strongly the veracity of the fact, and their analyses were very enlightening and instructive.

The System of Laozi's Philosophy: A Faithful Reconstruction

LIU Xiao-gan

Based on rigorous textual analyses,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three core concepts of Laozi's philosophy. *Dao*, the ultimate ground and source of the universe, provides the universally true value orientation for human existence. This is *ziran* or naturalness, which is not only the core value of Laozi's philosophy, but also the ideal state of peace and harmony that characterizes civilized societies. The concept of *wuwei* or non-action, the principled methodology in Laozi's philosophy, suggests a new way to maintain harmonious societies without coercive controls. These three concepts constitute a philosophical system: *Dao* models the ideal state of human worlds, namely *ziran*, which is the highest value in Laozi's philosophy; this is, in turn, realized by means of *wuwei*, a transcendent approach to maintaining the natural order of human societies-harmony and peace.

Laozi's Understanding of Human Self

YAN Shi-an

Of the ancient thoughts of human nature in China, what deserves more discussions is Xunzi's *xing'elun* (theory of original evil of human nature). Yet, indeed, Zhuangzi of the Daoist School made most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human ego. Valuing high the way of nature, or simply Daoism, Laozi and Zhuangzi both held that human problems of all kinds might be traced back to people's out-of-nature way of life and their egoistic consideration, thus leaving scholars of both Legalist and Confucian schools in their wake.